



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赫德与旧中国海关 论文选

中国海关学会 编

17=4

中国海关出版社

赫德与旧中国海关 论 文 选

中国海关学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赫德与旧中国海关论文选/中国海关学会编 .

-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4. 9

ISBN 7-80165-189-8

I . 赫… II . 中… III . 赫德, R. (1835 ~ 1911) - 人物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IVK835.617 = 43

(中国海关史学术研究丛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4703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 高烽

助理责编: 胡菡

责任校对: 永通

版式设计: 佑平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赫德与旧中国海关论文选

中国海关学会 编

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和平街东土城路 14 号 100013)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mm 1/32 开 印张: 9

字数: 240 千字 ISBN 7-80165-189-8

定价: 28.00 元

海关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图编部电话: 010 - 85271538

发行部电话: 010 - 85271610

编 辑 说 明

中国海关学会、厦门海关学会、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于2003年9月在厦门联合召开了赫德与旧中国海关理论研讨会。海关系统和高等院校的专业、非专业作者踊跃与会，围绕对总税务司赫德的评价、中国近代海关制度和海关参与的非海关业务活动等问题展开讨论。最后中国海关学会赵光华会长作了会议小结。会议对于澄清事实，明辨是非，形成共识，深化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会议共收到论文38篇，经本书编审组评审，以具有较高思想性和学术水平为标准，选择了26篇论文结集出版。入选论文大多按原文刊用，编辑时仅对个别文字或标点作了校正。有部分入选论文，由编辑人员作了删节或局部修改，但均忠实于作者原意。论文后列的参考书目限于篇幅原则上不予保留。

本书由吴乃文、戴一峰、叶凤美、连心豪、朱才良组成的编审组主持评议编审，由姚梅琳、贺华担任责任编辑。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论文作者和中国海关出版社、中国海关学会天津分会、厦门海关学会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感谢。

中国海关学会
2004年6月

序

中国近代海关史从一个重要方面记录了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缩影，也反映了中国人民为收回海关主权和关税自主权、赢得民族尊严和独立而进行长期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研究和了解海关历史有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爱国热情，更好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注意到，有些人宣扬：掌管旧中国海关实权长达 45 年的洋税务司赫德是“我国开展现代化的先驱”，“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对赫德以及旧海关的历史要重新评估，“还其本来面目”，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海关学会、厦门海关学会联合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及其他院校的名家、学者召开研讨会，就“赫德与旧中国海关”这一课题进行研讨，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会议围绕对总税务司赫德的评价、中国近代海关制度和海关参与的非海关业务活动展开研讨。论文作者对赫德的地位及作用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赫德掌管旧中国海关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赫德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忠诚卫士”。在列强在华利益与中国利益之间，赫德并不

是不偏不倚，而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一边的。对于清政府，他从外国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奉行扶植和改造的政策，竭力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列强的严格控制之下。赫德的“中国现代化”设想，就是要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以列强仆役的身份融入近代世界，固定不平等的中外关系，使列强各国在中国开辟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财富，增加其资本积累，加速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结果必然造成中国长期的贫穷与落后。有的作者指出，“赫德的所作所为都是由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殖民时代和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本能所决定的，他的所有活动都突出了中国的现代化与半殖民地沉沦同步的特点。”与会代表认为，赫德出任总税务司后，采用英国文官制度以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塑造惟我独尊的洋关，为清政府增加财源，筹集军饷镇压革命，延长了封建王朝的寿命。而赫德通过控制海关，既扩大和巩固了英国在华利益，又获得了个人的名利地位。不少作者认为旧海关的财务制度、统计制度、人事制度以及服务商界建立关商合作机制等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对建立现代海关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广泛介入各种非海关业务活动，是中国近代海关的一个突出特点。赫德以近代海关为大本营或以个人身份或以海关名义，曾先后介入近代中国外交、海务、邮政、教育、海军建设，代表中国参加博览会等诸多领域。有的作者认为赫德在外交领域的活动几乎都是为西方列强扩大在华势力范围与利益服务的，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至于在其他一些领域的活动，他的目的一方面是确保列强在华特权，另一方面是

显示赫德本人在中国的影响力，巩固其在中国海关的地位，但是这些活动本身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了解与交往方面，客观上也“起到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参会论文的交流与研讨对于澄清事实、明辨是非、形成共识、深化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本书选择会议上的部分论文结集出版，以方便读者阅读。为继续推进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我们倡议海关系统和高等院校的专业和非专业的作者团结、凝聚起来，形成一支非常设性的海关史研究队伍，采取个人分别撰稿、适当时刻确定主题进行研讨，继续不断地推进海关史的研究。

中国海关学会会长 赵光华

2004年6月

目 录

- 闻其言，察其行：《赫德日记》解读
- 兼论中西文化中介人 戴一峰/1
 - 从《中国问题论集》看赫德 叶凤美/14
 - 赫德在中国的“进步”事业
 - 兼论赫德与中国的近代化 连心豪/26
 - 论赫德与中国现代化 姚梅琳/36
 - 关于赫德的评价问题 文松/55
 - 记忆的历史
 - 解读海关洋员眼里的赫德 詹庆华/73
 - 试析赫德的“骑马”理论
 - 以庚子赔款谈判为例 徐从花 盛卓禾/101
 - 赫德其人 姚寿山/111
 - 赫德与鸦片战争后厦门关行政自主权的旁落 翁重德/116
 - “洋关”总税务司赫德略考 陈建平/124
 - 论赫德的保位战 贾德芳/129
 - 正确把握赫德研究方向 庄清水/143

· 2 · 目 录

试析赫德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作用”	
——赫德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吗?	曹恒礼 金茂新/150
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制度	赵森 157
从中国近代海关人事管理制度的基本架构和特点看赫德 ...	孙建国 翟后柱/165
试论外籍税务司制度的性质及历史作用	张耀华/182
论赫德对朝鲜海关的控制	叶玮/189
赫德在旧中国海关的地位和作用	王宏强/200
赫德与“澳门割让”始末	赵辉/206
赫德与博览会	
——以奥、法、英博览会为例	李爱丽/214
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	杨智友/226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中国金融近代化的早期关系	
——以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后的历史为例	詹庆华 魏娅娅/234
赫德时期海关邮政的发展	缪心毫/247
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赫德与1883年伦敦世界渔业博览会 ...	吕国鄂/256
赫德与中国近代教育	焦建华/263
试论近代福建海关的海务工作	林星/271

闻其言，察其行：《赫德日记》解读

——兼论中西文化中介人

戴一峰

一、导论

英人赫德无疑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一个举足轻重、影响甚巨的人物，也是中、英近代史和中英关系史上一个显赫一时、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于 1854 年应英国外交部招聘，到中国充任领事馆编外译员。⁹ 年后，即 1863 年，受命担任正处于草创时期的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总税务司，直到 1908 年回国休假，1911 年病逝英国。正是在赫德执掌大权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近代海关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系统的行政管理制度和业务运作制度，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号称“国际官厅”的“独立王国”。而赫德则成了这一“独立王国”的独裁者，“对于全国海关，几有一国元首之权威”。^① 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至今为止，中外学术界的评价可谓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毁誉参半，大相径庭。然而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这些评述大多立足于赫德执掌海关总税务司大权后的活动。赫德的这些活动当然是评述赫德的主要依据。但是，当我们想完整、准确复原、认知，从而全面、科学评价赫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时，我们显然需要放宽考察视野、拉长考察视线和变换考察视角。就赫德而言，从他来华到执掌海关大权的这段时间，即他进入中国后的最初 10 年，显然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阶段，

因为正是在这一阶段里，赫德的经历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来自异邦的年轻人如何可能登上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这样一个关系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职位；同时也向我们提示了决定他此等一系列活动的若干基本要素是如何形成的；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理论思考呢？

本文主要利用赫德自己的日记。赫德自来到中国后就有意识地坚持写日记，^②直到他 1908 年离开中国，留下的日记总数多达 77 册。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和他的两个同事经过艰辛的工作，整理出版了两卷本的《赫德日记》。其中第一卷覆盖了 1854 年至 1863 年这一历史时期，即赫德进入中国后的最初 10 年。尽管赫德自己晚年时曾因私人原因销毁了部分日记，给后人的研究留下许多遗憾，但尚存的这些日记已向我们透露足够多的有关这一时期赫德工作、学习、社交、以至日常起居生活等活动信息，以及他面对在华遭遇的惊奇、喜悦、困惑、失望、痛苦等种种情感体验和思想感触信息。因此，本文力图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细细解读这一段时期赫德的日记，力图更全面、完整地把握赫德，探讨我们由此触发的若干思考。

二、角色定位：特定历史时空内的文化中介人

任何一个显赫的历史人物都是一定的历史时空的产物，这是一条已被理论界普遍接受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赫德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界定产生赫德的这一历史时空，显然是我们科学认识他的前提和起点。众所周知，在赫德所处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为本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生存与发展竭力寻求扩大世界市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即创造出一个——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西方为中心的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④而此时的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封建时代晚期，腐朽的社会政

治与经济体制正日趋衰败，内部正滋长着各种破坏性和革命性因素的古老帝国，被迫卷入这个扩张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即被不断边缘化。简言之，赫德进入中国的最初 10 年，正值清王朝这个正在解体、衰败中的“木乃伊”，被不断卷入急遽扩展中的以西方列强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接受——从被动到主动——西方文明的改造，把这种文明嫁接到自己的躯体上。这样，从文化学的意义上说，赫德所处的历史时空，就是在 19 世纪后期的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中，于两者边缘形成的一个交错重叠文化带。而赫德，就是活动于这一文化带的一个文化中介人。当然，我们必须指出，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主体部分的本质特征是它的不平等性。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就是它的外部表征。这种不平等性源自于双方势能的不对等，信息的不对称。

事实上，在近代中国，我们可以清楚辨认出活跃于上述中西文化交错、重叠带的各种文化中介人社会群体，如海关洋员、传教士、买办和留学生等。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社会标识，有着各自主要的活动领域、活动方式和目标追求，因而有着不同的历史结局和作用。赫德正是第一种社会群体，即海关洋员的突出代表。这一社会群体是附着于中国近代海关，以海关为其活动大本营的。这就决定了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与中国近代海关密切相连。而中国近代海关，正是清王朝嫁接西方文明的最初产物。嫁接之所以从这里开始，是因为在当时，商品是西方列强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基本手段。扩大对华贸易，占领并控制中国市场，乃是中西贸易交通最初阶段，西方列强所追求的目标。而中国近代海关作为中西贸易的管理征税机构，自然首当其冲，最先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成了首先改造的对象。

嫁接一开始是强制性的。这是西方列强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清王朝的重要一环。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摧毁了清王朝的中西贸易管理征税旧体制，代之于以领事监督为主导的新的管理征税体制。这是西方列强强行嫁接、染指海关行政管理权的肇端。但嫁接并不能一蹴而

就。由于鸦片战争后数年间中西贸易陷入困境，西方列强在要求修改条约的同时，又开始新的嫁接行动。这便是上海近代海关的建立，外籍税务监督制度的产生。此后中西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嫁接的形式亦随之有所变更。

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初期，当西方列强在努力寻求扩大在华权益的最佳途径和手段时，清王朝的内部危机正随着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断加深而不断加重，并酿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由此导致了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的相互重新认识。认识的结果是：内外交困的清政府把农民起义视为心腹之患，必先除之，方得生存，为此必须对外妥协，寻求西方列强的帮助，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而西方列强则把清王朝视为扩大在华权益的最好工具，应先扶植，以求得利。这就引致了中西关系的变化，把原先冲突、对抗的双方引向合作。此时，嫁接渐渐从强制转向自愿，从被迫转向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海关便相继在各通商口岸建立，外籍税务司制度随之形成。清政府视其为摆脱财政困境，剔除关政弊端、以至调节、和谐中西关系的有效手段；西方列强则视其为改造清政府、谋求在华权益的有效工具。因此，在外籍税务司制度下形成的以赫德为首的海关洋员群体的历史使命就是如何成功嫁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观念，从而有效地维护由不平等条约所建构和规范的中西贸易交通秩序，进而言之，维护由西方列强建构和规范的，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就是上述特定的历史时空对以赫德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中介人群体，即中国近代海关洋员群体的最基本的角色定位。

在赫德的日记中我们可以读到上述中西关系演化的若干片断。他在宁波时虽然由于地位尚低，且远离中西政治经济交锋的中心，但有关的信息仍然不断传来，引起他的注意。^⑤ 到广州时，正值英法联军已攻占广州，关押了两广总督叶名琛，成立联军委员会治理广州，扶植广州巡抚柏贵充当傀儡。赫德由于充任当时有“实际上”的两广总

督”之称的巴夏礼的助手，进入权力中心，得以耳闻目睹当时联军委员会如何在广州维持所谓的“华洋共治”。^⑥待到 1863 年赫德再次来到北京，他已是海关洋员群体的首脑人物之一，并且成了作为中西合作标志的总理衙门的座上宾，成了总理衙门要员们信任的顾问。从此时赫德日记中，我们已可以清楚看到清政府如何由被动转为主动地接受西方文明，主要是物质文明的嫁接，而赫德又是如何发挥他作为中西文化中介人的作用与影响。^⑦

三、角色认同：文化中介人的个人因素

论及历史上的显赫人物，唯物史观在强调其活动的历史必然性、时代特征与局限性时，并不排斥个人因素的作用。诚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⑧就文化中介人而言，他们在中西文化交错重叠带活动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个人的角色认同，以及由此对两种交错文化的理解、适应和融会。从赫德日记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来华后的最初 10 年间，他如何逐渐了解、体察和适应他赖以生存和活动的文化带，以及他的某些性格特点，如何有利于他对一种异质文化的体验、理解和适应。

在对历史上显赫人物的认知和研究中，一种引人注目的普遍现象是，人们易于神化该历史人物的生平，尤其是他的少年、青年时期，以至到了显赫人物的第一声啼哭也似乎与众不同的荒唐地步。这实际上是唯心天才论的作祟。读赫德进入中国头一年——无论是在香港和上海的短暂停留，还是在宁波生活时——的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踏上异国他乡土地的普通青年，看到一个多重性格的赫德：一个虔诚的新教徒，一个内心孤独、易于伤感的性情中人，一个勤奋好学、渴望成功的年轻人，一个敏感柔顺、言举谨慎的异乡人等等。在此之前，这个出生于北爱尔兰一个繁华小镇的年轻人，在贝尔法斯特——一个迅速发展的爱尔兰工业城市——完成了他的高等教育，面对着举棋不定的职业选择，最终被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大英帝国的扩张浪潮推

到遥远的东方古国。^⑨

在中国的头一年里，赫德似乎一直沉浸在一种浓烈的宗教情绪中。事实上，他的第一篇日记就是以教徒式的诉说和祈祷开始的。^⑩他甚至一度希望自己成为传教士，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⑪此后，他不仅参加礼拜、听布道、阅读宗教书籍，和周围的人讨论宗教问题，而且时常在日记里连篇累牍地探讨宗教问题，剖析自己的思想和行为。^⑫然细读他的日记，我们不难觉察到，在赫德的宗教情绪背后，是他对现实困惑的一种挣扎，试图从宗教信仰中寻求慰藉和安宁。因为此时的赫德，一方面正为自己在到中国前在家乡的荒唐行为感到道德压力和内疚；另一方面则面对异国的孤独、单调生活和不确定的前景感到沮丧、忧虑和躁动不安。^⑬他甚至后悔自己选择到中国来，多次萌生打道回国的念头，对自己追求功名的念头大加责难。^⑭他在 1854 年 10 月 4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由于我已下决心尽早回爱尔兰，所以感到更快活和满足。是的，最好是回到自己的朋友当中去，那会更使人感到欣慰，比在异域没有社交圈，没有任何创业的乐趣要好得多；在异域即使成功立业，身体垮了也无法享受，或只是能够享受有限的几年。这岂非虚度年华？我不应该是这样。”^⑮这一时期的赫德，显然正处于对自己社会角色认同、异质文化适应的磨合阶段。当 1858 年 3 月他到广州任新职后，他的日记显示，他已经基本完成了角色认同的困惑阶段。但对异质文化的认知和适应，仍在继续，尤其是对中国官场文化的认知和适应。^⑯

勤奋好学、刻苦学习，可以说是赫德品格中突出的一点。他具有良好的阅读学习习惯。在他写于 1854 年 8 月 27 日的第一篇日记中，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每日活动安排表，其中阅读学习占了绝大部分时间。^⑰从他此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确实保持良好的阅读学习习惯。他不但从欧洲订阅了杂志、书籍，还时常向同事、朋友借阅书刊。^⑱当然，这一时期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他的中文学习。在他的日记中留下大量关于中文学习的记录。从中我们得知，赫德不仅聘用了以他微薄的工资所能请到的当地最好的官话教师教他汉语，而且自己坚持

阅读各种中文书籍，包括四书五经这样的古籍经典、《圣谕广训》这样的道德说教和《红楼梦》这样的清代小说。他还曾学习当地方言——宁波土话。他确实在学习中文上下了功夫。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除了刻苦又刻苦的学习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克服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中的困难。我下定决心要完全掌握它们。”¹⁹

赫德后来的汉语水平一直为人们所称道。精通汉语确实给他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许多便利和优势。这是他扮演中西文化中介人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在他以后的事业生涯中，他反复对海关洋员强调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表明他对自己和海关洋员群体角色定位的清晰认知。这种认知，无疑是从他进入中国的最初阶段开始的。

不过，在赫德的个人性格中，影响他对文化中介人角色认同最大的是他的敏感、柔顺和谨慎。这是一种多血质的性格。敏感使他对周围的事物保持着强烈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同时具有敏锐、细致的观察力。我们时常可以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他对周围事物的体察入微的描写。正是通过这些观察和体验，赫德逐渐了解了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规矩，尤其是了解了中国传统官僚体制的基本状况和官场的运作规矩。²⁰作为文化中介人，这是他体验异质文化的一种重要品质。

在赫德执掌海关大权后，他一直是以对部下的严厉著称，这使人们忽视了他性格中柔顺、谨慎、甚至于羞涩的一面。但在他进入中国的头 10 年中，他性格的这一面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事实上，他日记中对于自己内心矛盾和灵魂拷问的许多记载，已经透露出他性格柔顺、纤弱的一面。²¹甚至在面对和处理个人日常生活问题时，我们也时时可以领略到他的这一性格特征。我们不妨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赫德一度迷恋上玛丽亚·戴尔小姐，但当在一次集体出外旅游，表达自己情感的机会来临时，他却羞于启口。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走在戴尔小姐轿边大约 1 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说得很少。当我要‘宣布爱情’等等时，我有六七次几乎晕倒。我有一次竟然清了清嗓

子，但我喘不过气来，也就说不下去了。我让机会溜掉——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青年呀!!!（一连3个感叹号——笔者）”^②赫德性格的这一面使他更易于立足中西文化交错带。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官场中的“面子”文化，考虑到当时清朝官员刚刚睁眼看世界时的矛盾心态，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赫德性格的这一特点，使他更易于和清朝官员打交道。这点，在他1861年进入北京，奔走游说于总理衙门时得到特别突出的表现。以致他深得恭亲王奕訢和文祥等总理衙门要员的欢心，被他们视为“我们的赫德”，力荐他出任总税务司一职，并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称赫德：“察其性情，尚属驯顺”，^②可见赫德性格的这一面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对此，我们在下面还要对比李泰国作进一步分析。

四、角色对比：赫德与李泰国的性格遭遇

人们常说，任何一个显赫的历史人物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如果没有赫德，当时的中西关系也会创造出一个类似的人物。这样说并没错。但是，如果我们变换思考的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设问：为什么历史选择了赫德而不是别人？我们上一节的论述已经基本回答了这一问题。在本节中，我们拟以赫德与李泰国不同遭遇的对比，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知。

李泰国和赫德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同样是英国人，同样受过中西两种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同样在青年时期以英国驻华机构编外译员的身份开始自己在中国的政治生涯，同样曾执掌中国近代海关大权，成为海关洋员群体的首脑。作为中西文化中介人，李泰国甚至曾拥有远比赫德有利的条件和资源。李泰国的父亲李太郭早在1841年就来到中国，曾历任英国驻广州、福州和厦门的领事。这使李泰国在开始其政治生涯时，有着远比赫德丰富的政治关系可资利用。此外，李泰国比赫德早7年，即于1847年，来到中国。在他于1855年接替威妥玛出任新建上海海关英籍税务监督，进入海关工作之前，他已经先后担任过英国驻香港商务监督署编外译员、二等助理、香港警务署及最